

BRONZE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LASSICS OF FORBIDDEN CITY

故宫经典

故宫青铜器图典

故宫博物院编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FORBIDDEN CITY
BRONZES OF THE FORBIDDEN CITY

故宫青铜器图典

故宫博物院编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宫青铜器图典 / 故宫博物院编. —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0.6

(故宫经典)

ISBN 978-7-80047-992-2

I. ①故… II. ①故… III. ①青铜器 (考古) — 中国 — 古代 — 图录 IV. ① K876.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0166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郑欣淼

副主任 李 季 李文儒

委 员 纪天斌 王亚民 陈丽华

冯乃恩 余 辉 胡 锤 张 荣 胡建中 闫宏斌 宋纪蓉

朱赛虹 章宏伟 赵国英 付红展 赵 杨 马海轩 娄 玮

故宫经典

故宫青铜器图典

主 编: 丁孟

摄 影: 李凡 赵山 刘志岗

拓 片: 郭玉海

责任编辑: 冯印淙 方妍

编辑助理: 周利楠

装帧设计: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王梓 吴鹏

出版发行: 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邮箱: gugongwenhua@yahoo.cn

制版印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2

印 张: 27

字 数: 95 千字

图 版: 282 幅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047-992-2

定 价: 290.00 元



目 录

- 002 / 凡例
- 003 / 故宫青铜器综论 丁孟
 - 012 / 商代
 - 074 / 西周
 - 140 / 春秋
 - 182 / 战国
 - 240 / 汉代
 - 266 / 宋元明清
- 302 / 青铜器精品目录
- 306 / 铭文著录简表
- 316 / 本书相关文献一览表
- 320 / 后记



凡例

一 本书所收青铜器均为故宫博物院现藏品中有代表性者。

二 收器时代包括秦统一前的早期青铜器、两汉青铜器，以及上启北宋下迄到清代的晚期青铜器。

本图录标注的年代与公元纪年对应如下：

商代前期	公元前 1600 ~ 前 1300 年
商代后期	公元前 1300 ~ 前 1027 年
西周早期	公元前 1027 ~ 前 966 年
西周中期	公元前 966 ~ 前 865 年
西周晚期	公元前 865 ~ 前 771 年
春秋前期	公元前 771 ~ 前 652 年
春秋后期	公元前 652 ~ 前 476 年
战国前期	公元前 476 ~ 前 369 年
战国后期	公元前 369 ~ 前 221 年
西汉早期	公元前 206 ~ 前 141 年
西汉中期	公元前 140 ~ 前 33 年

西汉晚期	公元前 32 ~ 8 年
东汉早期	25 ~ 88 年
东汉中期	89 ~ 168 年
东汉晚期	168 ~ 220 年
北宋	960 ~ 1127 年
南宋	1127 ~ 1279 年
元代	1271 ~ 1368 年
明代	1368 ~ 1644 年
清代	1644 ~ 1911 年

三 器物排列大体以时代段落的先后为序。

四 凡有铭文之器皆附铭文拓本（或照片）和释文，铭文内容重要者附解说。其著录情况见《铭文著录简表》及《本书相关文献一览表》。

五 释文直接以典籍用字，按铭文原款式隶定，其中的缺字以“□”表示，以意加补的字，在 [] 内书写。

故宫青铜器综论

丁孟

吉金千古——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优秀传统

考古学者将早期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根据生产工具的材质，区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我国，较大件的青铜器最早出现在河南二里头文化晚期，约当夏代（公元前21～前16世纪）晚期。此前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时期虽有小件红铜或青铜制品发现，但数量少、物件小，还不能说那个时期已脱离了铜石并用时代。有的二里头铜爵，从铸痕看，内外范多达四块，器壁薄而均匀，其工艺水平已脱离最原始状态，因此不能排除我国在夏代前期已掌握青铜冶炼技术的可能。所以，古史所记“夏铸九鼎”的传说，或有所本。青铜器伴随着早期国家的确立而出现，自然就成为王权的象征。传说夏鼎历商至周，每当王朝改易，鼎则移于新主。

商代盘庚迁殷之后，国力渐强，特别在武丁时期，达到顶峰。为适应其神权统治，需要进行大量繁复的祭祀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青铜祭器是神坛上的重要道具，因而此期青铜器铸造工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体积厚重、纹饰神秘庄重的青铜器大量涌现，形成了我国青铜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西周建国，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礼乐文明”是西周文化的重要内涵，礼乐虽非出自西周，周礼却是将原有的“礼”与等级制度最终结合。礼乐制度，使周代统治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早在商代前期，青铜器上就开始有仅几个字的、以象形为特征的族名铭文出现，到商代晚期开始有长达数十字的记事铭文出现，进入西周以后，更出现了许多百字以上的长篇记事铭文。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铭其功烈以示子孙”^[1]，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史料。

春秋时期，诸侯力政，礼崩乐坏。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自春秋中期始，青铜器的地域特征突显，中原、楚、秦、吴、越等地的青铜器各自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一些小国的青铜器也成规模地出现。

战国时代的青铜器逐渐向实用方向发展，新的形制不断出现，纹饰趋于图案化，还出现了一些描绘攻战、狩猎、礼乐、桑植的写实图画。

铁质生产工具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标志着铁器时代的到来。我国大约在春秋早期开始出现铁器，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5世纪前后）铁兵器和工具逐渐增多，至战国中期，铁器在农业及手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楚、燕等国军队也基本以铁兵器装备。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青铜器流入民间，脱去神秘的外衣，以日常生活用品和工艺品的身份，留存在社会生活里。但是，随着礼制传统的延续，作为藏礼工具的青铜礼器，在其后历代礼仪制度中，仍保留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礼乐文明——中国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

成组合的具有“藏礼”作用的青铜礼器体系，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这是由于“以礼治国”是中国古代所独创的统治艺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仪体系，贯彻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了其后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带有鲜明礼仪特色的中国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礼，即礼制、礼仪，是指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它受

国家政权的保护，又有社会舆论支持，是任何人都应该且必须遵守的行为准绳。

自夏启谋得王位开始，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也由此而诞生。尊君抑臣、君贵臣卑便成了国家政权要实现的目标与维护的秩序。于是，产生了夏礼，并且开始把礼的外延推到了用器的方面。商因袭夏礼，至周，复因商礼。商、周除继承前人的礼制外，又舍弃诸项过时的内容并增加了时代的需求。

孔子在总结三代礼仪制时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所说，概括了夏、商、周三代之礼仪制度的一脉承传性质，并从中看出彼此间的差异是为适应时代形势而进行的修正。至于孔子指出的后世礼制纵然少不了诸多对前代礼仪的损益，但已不可能超越《周礼》——周代礼制的基本框架。校诸史实，孔子的预言确实不差。而孔子对前代的总结，虽无更多的文献证实，但考古发现的众多材料于此则提供了佐证。

近数十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遗址、偃师尸乡沟及郑州早商遗址和商城、安阳殷墟、洛阳周王城、陕西长安沔西、沔东西周城址和墓地的发掘，已获取了大批量的礼器。从其中能构建起来的礼制用器情况看，夏商两代共有的爵、觚、斝之组合，商周两代鼎、簋、编钟等之组合及使用，乃三代礼制承继一体的表现，也就是商、周之礼分别以夏、商之礼所“益”的部分。此外，簋在商代的出现，敦、簠、盥、禁等在西周的使用，可谓“益”的另一种方式。与之对应，爵、觚等酒器在周代

的衰竭，乃系周礼对殷礼的“损”了。历代以来出土的三代青铜彝器，正是后人目睹三代青铜文明史的实物材料。

三代以后，自汉至明清，2000余年间，朝代更迭，物质原料的日益更新，都没能冲击《周礼》，相反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宗法《周礼》，并视为治国的根本。于是，自汉代开始，铁、原始瓷器、瓷器等，都步入礼坛，被做成了礼祭器物。在质地上固然有异于三代的青铜彝器，可其用途与铸造它们的本意，以及统治者对他们的占有和垄断情况，和三代统治者垄断青铜器毫无两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明正赖“寓于礼”才得承传不衰。

在大量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另一突出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一书，是目前收录古今中外金文资料较为详备的著作，它著录先秦有铭青铜器近12000件，加上该书出版后公布的同类资料，共计约13000件左右。据1985年版《金文编》^[2]统计，先秦金文单字有3772个，已识字2420个，未识字1352个。

金文的内容就其大者而言，可分为以下几项：

1. 祭奠父祖，许多器铭仅记父祖日名，表示该器为纪念其父祖而作。
2. 铭功纪赏，作器者记述自己对王室（或某大贵族）在祭祀、战争、外交、政务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因而受到嘉奖、赏赐和册命的荣宠。
3. 要盟约剂，“凡大约剂书于宗彝”^[3]记录贵族间发生的土地、人事等纠纷，经王室派员调解裁断、订立盟誓的经过，以传示子孙后代。

4. 媵女陪嫁,记述作器者以该铜器作为嫁妆,送女出嫁。

5. 祈介祝嘏,西周中期后的乐器、礼器上多记载一些祈求祖考降赐福禄长寿的“嘏辞”。

6. 物勒工名,战国兵器上多记督造衙府及工官工匠之名,容器上则多记容积重量。

金文成为史料的关键,首要在明确其时代,对于西周金文的断代问题,王国维在考释通簋时指出:“此敦称穆王者三,余谓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满也。何以生称穆王?曰: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4]学者称其断代原则为“时王生称说”。郭沫若用此原则先定出若干“标准器”,然后将与其人名、事件有关,形制、纹饰相近诸器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相近的器组,此法被称为“标准器断代法”。在《两周金文辞大系》^[5]中串联西周铭文250件,取得很大成功。陈梦家又根据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提出铭文的八种内联条件^[6]:1. 同作器者。2. 同时代人。3. 同父祖关系。4. 同族名。5. 同官名。6. 同一事件。7. 同地名。8. 同一时间等,将此法加以进一步完善。

唐兰先生著名的《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7]和《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铭刻》^[8],讨论了西周金文断代问题,他指出金文中的“康宫”即康王之庙,凡记有“康宫”的铜器应定为康王身后之器。这样就把过去定在成王时期的一批器改定于昭王时期,并与昭王南巡的记载联系起来。根据这一原则,金文中所记“康宫”中的“夷宫”、“厉宫”,应为夷王、厉王之庙,金文中凡记有夷、厉二宫之器,自应是夷王、厉王身后之器。他的这些分析,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与考古发掘的器物相矛盾者,并不断被新出土的

铜器铭文所肯定。因而,他的“康宫原则”也逐渐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近年国家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9],在讨论西周铜器断代时,就使用了“康宫”原则。这一原则对铜器断代之学做出了新的贡献。

从铭文内容来区别商代与西周铜器,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10]已有论述,近年来有的学者作出了更好的归纳,提出^[11]:1. 殷人特有的称谓。2. 殷人特有的祭名。3. 殷人的标时习惯。4. 殷代的历史大事件。这些原则对区分商周铜器是有一定作用的。当然,须铜器的类型学研究与之相并而行,方能得到较理想的结果。

西周金文中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记时词语,王国维作《生霸死霸考》^[12],认为西周金文纪时,是由上述四个月相词语四分一月的。近时学者根据已知的古代天文学史知识推算,金文“初吉”的历日往往超出月初若干天的范围,有的甚至可以晚到月的下旬,显然与其他三个词语属不同记时体系。“既生霸”、“既死霸”、“既望”是月相记时词语,学者间曾无异词,然其所指具体时日,至今尚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西周青铜器有纪年金文者90余件,用这些资料可以推出西周各王的最低金文王年。又有年、月、月相、干支日,四项俱全的金文30余件,这些资料可以检验按铜器铭文所安排的王年和绝对时间是否恰当。陈梦家《西周年代考》^[13]指出:“《竹书纪年》和金文记年是复原西周年代的主要材料。”据《竹书纪年》所载武王伐纣应在公元前1027年,西周积年为257年。根据现代天文学观察,《竹书纪年》所记“懿王元年天再旦”是一次正确的古代日

食观测,这样懿王元年即可定在公元前899年。以上几个年代定点,都与相应的考古地层标本碳14测定的年代接近。又据《史记》载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此后宣王幽王的年代都是已知王年。根据以上定点,利用现代古天文学史知识推算,可以排出一个合理的《西周金文历谱》,使数十件有铭铜器成为标准器,再附以铭文的内部联系和以考古类型学原理分析科学发掘品在器形、纹饰等方面的经验,将基本解决西周金文的断代问题。一个与所拟《金文历谱》相容的《西周王年表》,也将得到最终的承认。

商周有铭铜器的半数左右铭文都极为简短,有的仅有一个象形性很强的字,有的由几个象形的字构成一个短语。郭沫若称其为“族徽”、“族氏”^[14],陈梦家称其为“族名”^[15],张振林有“家族标记说”^[16],吴其昌有“私名说”^[17],日人白川静有“特殊集团说”^[18],林巳奈夫有“旗上之物说”^[19]等,诸说皆能言之成理,各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部分器物上铭刻的内容,但终难以偏概全。

其实,早在宋代对金文中的“特殊铭刻”就有一定认识。如《考古图》^[20]4、36木父己卣,释文云:“木者,恐氏族也。”我们认为,这类铭文虽少有文例比附,但多数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同形的字,而分析甲骨文中这些同形字的性质,则多是一些方国名、地名和人名。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些金文“特殊铭刻”中应该有一大部分是古代方国(地区)、家族以及个人的名号。殷周金文“特殊铭刻”中的古代方国名,被成功解读的有三个例证:1. 郭沫若释“𠄎”为“须句”^[21]。2. 裘锡圭释“𠄎”为“无终”^[22]。3. 辽宁喀左曾出土“𠄎|𠄎”彝,唐兰考其出

土地为古“孤竹国”^[23]。李学勤循此考出其文字亦为“孤竹”^[24]。依此类推,相似的古方国名如“息”、“斟寻”、“房子”、“北子”等,也可以在铜器中找到相应的铭刻。

“特殊铭刻”中还有一些可以肯定为某贵族的家族名者,如“木羊册”是微史家族的族名等。又比如“亚囊孤竹迺鼎”,在这一组铭文中,已知“孤竹”是方国名,“亚囊”因为在其他器中经常出现,可能是孤竹国中某家族的族名。在这里“迺”就可能是“亚囊”家族的一个成员的私名。根据上述分析,金文中字数较多的族名,一般是可以分为方国、家族、私名等几个层次的。此外,也有一小部分特殊铭刻是表示该铜器的方位、功能、或是八卦符号等,并不属于上述内容范围。

这些族名铜器的时代,有的可以早到商代早期,如1981年内蒙敖包村出土的𠄎𠄎^[25]。多数属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仍有少数残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真实状况,对商周社会结构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尊文绎器——历代青铜器与金文研究

早在汉代就把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开始注意对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西汉宣帝时的张敞考释夷臣鼎,被称为“好古文字”^[26],东汉古文派巨子许慎作《说文解字》^[27],其序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古文。”

至宋代,由于得到王室的倡导,青铜器与古文字的研究,蔚成风气。成就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考古图》^[28]、《博古图录》^[29]、《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30]、《啸

堂集古录》^[31]、《钟鼎款识》^[32]、《绍兴内府古器评》^[33]、《皇祐三馆古器图》^[34]、《先秦古器图》^[35]、《集古录跋尾》^[36]、《金石录》^[37]等。从研究水平看,他们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如至今尚在使用的器名:钟、鼎、鬲、甗、敦、簋、簠、壶、尊、卣、爵、角、觚、斝、觥、盃、盘、匜等皆宋人所定。王国维说:“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38]为宋人所辩识的古文亦有几百字。应该说,有宋一代,为后世的金石学以及近代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清代乾隆年间,钦定将皇家收藏编辑了《西清古鉴》^[39]、《宁寿鉴古》^[40]、《西清续鉴甲编》^[41]、《西清续鉴乙编》^[42]等四部青铜器资料书。晚清在乾嘉经学考据之风的影响下,“小学”得到发展,学者们除编辑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43]、《邃斋集古录》^[44]、《捃古录金文》^[45]、《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46]、《奇觚室吉金文述》^[47]等青铜器资料书外,还撰写了《说文古籀补》^[48]、《古籀拾遗》^[49]、《古籀余论》^[50]等颇有见地的古文字学专著。

民国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我国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有了很大进步,如一些青铜器资料书《周金文存》^[51]、《小校经阁金文拓本》^[52]、《善斋吉金录》^[53]、《梦卮草堂吉金图》^[54]、《双剑谿吉金图录》^[55]、《武英殿彝器图录》^[56]等,铭文用拓本,图像用照片,资料翔实完备,出版技术亦有很大改进。

此期学者王国维,在其著名史学理论“两重证法”的指导下,重视对古器物 and 古文字的研究。他对金文断代和一批铭、物的考证,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主要著作多

收入《观堂集林》^[57]一书。罗振玉的学术实践,以严谨地整理出土资料见长,他编纂的《三代吉金文存》^[58]收器近五千,是20世纪30年代殷周金文集成性的著作。二人关系密切,史称“罗王之学”。

王氏弟子容庚,著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59]等书,系统地总结了古器物与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

王氏另一弟子徐中舒,擅长运用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来研究古代的铭、物制度,也取得许多扎实的成果。

于省吾是近代学者中辩识古文字较有成就的一位,他善于借助古文献考释古文字,更善于用古文字整理和考证古籍,所著《尚书新证》^[60]、《诗经新证》^[61]、《诸子新证》^[62]等在学术界曾产生较大影响。

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63]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古文字学理论著作,《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64]则是作者用金文研究西周史的重要作品。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65]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巨著,它创建的“西周断代、东周分国”的研究体例,把分散的铭文资料整理成互相关联的史料,成为揭示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有力证据。他撰写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66]、《金文丛考》^[67]等金文专著和论文,都体现了把金文研究与先秦史研究有机结合的鲜明特色。

陈梦家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68]收集了流散在美国的珍贵铜器资料,他收集的欧洲各地的金文资料都已编辑在《殷周金文集成》^[69]18册一书中。他

的《西周铜器断代》是对《大系》一书的补充。他注意对器物分型分式、成坑成组的研究，把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到了古器物、古文字研究中。

外国学者如瑞典高本汉，日本白川静、林巳奈夫等也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作出过很好的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开展，青铜器资料大量出土，几乎填补了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绝大部分缺环。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亦日渐缜密，又得到考古学会、古文字学会等民间学术团体的有力推动。学者们一方面全面集结金文资料，作基础建设；一方面在前代学者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深入开拓进展，除解决了学科本身的诸多问题外，还解决了古史研究和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广泛注意。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学，已从“蕞尔小学”一变成为“当世显学”。

物华天宝——故宫青铜器的特殊性

早期青铜器曾作为王权的象征物存在于世，其庄重典雅的形制，狞厉威严的纹饰，深得帝王之心，因而历代王室都十分重视青铜器的收集和整理。清代皇家收藏，在乾隆年间即已达数千件之多，除一部分在1949年迁至台湾，一部分流失外，一部分仍保留在故宫。加上新中国建立以后陆续由政府调拨、私人捐献和本院收购的大量青铜器，故宫博物院现藏历代铜器15000余件，其中先秦青铜器约10000件左右，是国内收藏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

时代序列完整和器类齐全是故宫铜器另一特色，故宫藏品多数为传世品，但借助于近代考古学对发掘品研究的

经验，故宫先秦青铜器已可分出商代前期、后期，西周早、中、晚期，春秋前期、后期，战国前期、后期等，秦以后铜器可分出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等。

故宫藏先秦铜器的内容包括礼器、乐器、兵器、杂器等。其中礼器包括：

(1) 食器：鼎、鬲、甗、簋、簠、盨、敦、豆、铺、铉、匕、勺等。

(2) 酒器：爵、角、斝、盃、尊、卣、壶、罍、兕觥、方彝、甗、瓶、甗、缶、觚、觥、觥、斗等。

(3) 水器：盘、匜、鉴、盂、盆等。

乐器包括：钟、镈、铙、铎、铃、勾、铎、铎于、磬等。

兵器包括：戈、戟、矛、剑、铍、匕首、刀、斧、钺、异型兵器、镞、尊、铍、胄等。

杂器包括：炉、铲、虎子、樽、节、镜、阳燧、带钩等。

故宫收藏的秦汉青铜生活用品和唐宋以来的仿先秦青铜礼器，都有一定规模。此外，还有历代货币10000余枚，铜镜4000面，以及明、清时期的“宣德炉”等铜器数百件。

国内各博物馆现藏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估计不超过6000件，而故宫现藏已达近1600件，数量列各馆之首。这些青铜器的铭文大多已收入《殷周金文集成》一书，但器形大部分尚未公布。铭文较重要的如：

卣其三卣，是商代铭文最长的几件器，它记述了帝辛时期的赏赐、祭祀等内容。曾有的学者怀疑其中二祀、四祀卣为伪器，故宫博物院曾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组织“笔谈”，并在1999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上公布了本院所作X射线检测报告，却除怀疑，肯

定了它们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此外，像小臣告鼎、邕簋等也是重要的商代铜器。

成周铃是西周早期难得一见的带铭文的乐器，鲁侯爵则是记录周公后裔活动的重要铜器。此期的荣簋、耳尊、作册虎卣，记载了王与侯对荣、耳、虎的赏赐；西周中期的师旂鼎记录了一次法律诉讼过程，同簋、太师虢簋、豆闭簋记录了王对贵族的册命，格伯簋记录了当时的土地交换；西周晚期的扬簋、谏簋、小克鼎、眉敖簋盖、师酉簋、颂鼎、大鼎、师克盃、鬲比盃、寰盘、虢叔旅钟、士父钟等多记录王对贵族的赏赐册命仪典，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中太师虢簋、大鼎、颂鼎、鬲比盃、寰盘等5件器的记时词语中有年、月、月相、日四项内容，是全部金文仅有的三十九例四要素俱全器中的5例，这是研究金文历谱和王年的珍贵资料。

春秋后期的能原搏与台北故宫的一件，是一组越国编钟中仅存的两件传世品。有一批越国铜器上的铭文，目前尚未得到很好释读，这是多年困扰古文字学界的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故宫博物院在院刊上对此展开讨论，以期推动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者盞钟、余曩逖儿钟、徐王子旃钟、其次勾辂等，则是这一时期著名的青铜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少虞剑、梁伯戈、秦子戈、大良造鞅镞等也都是有明确时代特征的传世著名兵器。

两汉时期青铜器继续向日常生活器皿发展，并有了新的特点与风格，故宫藏西汉鎏金博山炉，既是实用器，又是优美的艺术品，体现了匠师的杰出技艺和非凡的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东汉建武廿一年（45年）乘舆斛，通

体鎏金，铸造精美，其刻铭对研究汉代官府的铸铜业有很大价值。

自宋代以来，地不爱宝，青铜礼乐器时有出土，其上威严的纹饰，雄伟的气度，深得帝王之心，被视为国之祥瑞。于是官民贡献于上，皇室搜求于下，逐渐成为皇家的重要典藏。宋代曾集官中所藏编成《宣和博古图录》。清代乾隆年间，则将官中藏青铜器先后编辑了《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等图录。而正是这些著作，为当时的仿古提供了最适宜的范本。

青铜器的复古风尚，在宋代就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明中叶以后蔚成风气，乾隆时期则集其大成。仿古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对商周，特别是西周青铜礼器的仿制，它是晚期帝王对于重现圣王时代的自矜，同时也是对他们心目中宫廷工艺典范的一种探索。

故宫藏北宋大晟钟、元朝至大盃、明代潞国铜鼎、清代天鸡尊等都是著名的标准器。

另外，故宫还保留有陈设或具有实用价值的青铜制品，它们大多造型生动，可以说是此期青铜制品的精华，从中也可以窥见当时青铜器铸造业的发展情况。如：故宫目前保存着4对清代所铸的铜狮子，即养心门前一队，长春宫前一队，宁寿门前一队，养性门前一队。其中有的铜狮胸前或铜座上还刻有“大清乾隆年造”字样。铜狮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它们都蹲踞在铜座或石座上，作张口露齿状，颈上有鬃，颈下系铃和缨络。雌狮作戏逗小狮状，雄狮则作玩耍绣球状。除铜狮外，在故宫内还陈设有许多铜制立体动物雕塑，其中主要有太和殿露台上的铜龟、铜鹤，储秀

宫前的铜鹿、铜龙，翊坤宫前的铜凤、铜鹤，这些动物雕塑均惟妙惟肖。宫廷内陈设这些动物雕塑，不仅炫耀宫廷的豪华，而且还借以显示封建君主的“尊贵”和“威严”。

在故宫太和殿和乾清宫各陈设着一件铜嘉量，前者为方形，后者为圆形。这两件嘉量，是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年）仿照王莽新始建国元年（9年）的标准量器新莽嘉量而制作的。乾隆时将嘉量“列于大庭”，除有陈设意义外，主要是以此象征国家政权的统一。

在故宫内的一些重要建筑物前，都有巨大的水缸，这些圆形平底的大铜缸，据《大清会典》记载，宣统年间禁城内共有太平水缸308口。在乾清门前放置的10口鎏金缸，每口缸直径1.6米，高1.2米，重3392公斤，缸上刻有“大清乾隆年造”铭文，缸的两侧饰有龙头耳环。从乾隆年间档案得知，当时铸造这样一大口铜墙铁壁质鎏金大缸，要花费500两白银。这些缸是为贮水防火而设置的。

这些“晚期青铜器”作品，反映了此时人们对华夏文明悠久传统的追忆中所获取文化复兴的灵感与动力。总之，中国的青铜艺术，源远流长，各时代呈现不同的意义与风格，历久弥新。故宫博物院的这部分藏品，将使人更能体察中国古文明之博大精深。

注释：

- [1] 《左传·襄公十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 [2] 容庚著：《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
- [3] 《周礼·秋官·司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 [4] 《观堂集林》卷一八，中华书局，2004年
- [5] 科学出版社增订本，1957年
- [6] 《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
- [7] 《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 [8] 《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
- [9] 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
- [10] 中华书局，1987年
- [11] 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
- [12] 《观堂集林》，中华书局，2004年
- [13] 商务印书馆，1955年
- [14]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
- [15]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
- [16] 张振林：《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的理解》，中国古文字年会论文，1990年
- [17] 吴其昌：《金文氏族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
- [18] 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 [19] 日本·林巳奈夫：《殷周时代的图象记号》，《东方学报》，京都第39册，1968年
- [20] 宋·吕大临：《考古图》，中华书局，1987年
- [21] 《金文余释之余·释须句》后收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2年

- [22] 中国古文字学会年会论文, 1990年
- [23] 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 1973年第10期
- [24] 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 1975年第5期
- [25] 《内蒙古文物与考古》第2期, 1982年
- [26] 汉·班固撰,《汉书·郊祀志》, 中华书局, 2007年
- [27] 汉·许慎,《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1963年
- [28] 宋·吕大临著, 元祐七年(1092年)成书
- [29] 宋·王黼奉敕著, 宣和(1119~1125年)间成书
- [30] 宋·薛尚功著, 绍兴十四年(1144年)成书
- [31] 宋·王休编, 石印淳熙本, 商务印书馆, 1922年
- [32] 宋·王厚之辑, 中华书局, 1985年
- [33] 宋·张抡, 影印本, 中华书局, 1986年
- [34] 宋·杨南仲编, 皇祐三年(1051年), 宋仁宗诏令秘阁与太常出所藏三代钟鼎, 为太乐制作礼乐器的参考。又诏墨器款以赐宰相, 这是文献记载的彝器墨拓之始。现此书已佚。
- [35] 宋·刘原父著, 此书作于嘉祐八年(1063年), 它首开了私人著录铜器的风气, 现已佚。
- [36] 宋·欧阳修, 刻本,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
- [37] 宋·赵明诚、李清照著, 影印本, 中华书局, 1991年
- [38] 《观堂集林·说觥》, 中华书局, 2004年
- [39] 清·梁诗正等人奉敕著, 内府刻本, 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
- [40] 清·乾隆敕编, 1913年涵芬楼依宁寿宫写本影印
- [41] 清·王杰等奉敕著,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成书
- [42] 宣统二年(1910年)涵芬楼依宁寿宫写本影印
- [43] 阮元编著, 刻本重印, 中国书店, 1996年
- [44] 吴大澂编, 刻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 [45] 吴式芬编, 刻本, 吴重熹,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 [46] 方浚益著, 石印本, 商务印书馆, 民国13年(1924年)
- [47] 刘心源著, 影印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1年
- [48] 吴大澂著, 商务印书馆, 1936年
- [49] 孙诒让著, 刻本, 光绪十四至十六年(1888~1890年)
- [50] 孙诒让著, 中华书局, 1989年
- [51] 邹安辑, 影印本, 上海仓圣明智大学, 民国10年(1921年)
- [52] 刘体智辑, 石印本, 民国24年(1935年)
- [53] 刘体智辑, 影印本, 上海图书馆, 1998年
- [54] 罗振玉辑, 影印本, 民国6~7年(1917~1918年)
- [55] 于省吾辑, 影印本, 北平来薰阁, 民国23年(1934年)
- [56] 容庚辑, 影印本, 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民国23年(1934年)
- [57] 中华书局, 2004年
- [58] 影印本, 中华书局, 1983年
- [59] 哈佛燕京学社铅印本, 1941年
- [60] 石印本, 民国23年(1934年)
- [61] 铅印本, 民国25年(1936年)
- [62] 中华书局, 1962年
- [63] 齐鲁书社, 1981年
- [64] 中华书局, 1986年
- [65] 科学出版社增订本, 1957年
- [66] 人民出版社, 1954年
- [67] 人民出版社, 1952年
- [68] 科学出版社, 1952年
-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84—1994年

商代

敬天祀祖——商代青铜器

二里头文化以后的商代青铜器，可分为二里岗期和殷墟期两大阶段。河南郑州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器是商代前期的代表。其后河北藁城、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山东大辛庄、河南偃师等地也相继出土同期青铜器，表明其分布得相当广泛。殷墟期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期。商代自盘庚迁殷之后，国力渐强，特别在武丁时期，达到顶峰。为适应其神权统治，需要进行大量繁复的祭祀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青铜祭器是神坛上的重要道具，因而此期青铜器铸造工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体积厚重、纹饰神秘庄重的青铜器大量涌现，形成了我国青铜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商代前期青铜器直接继承着二里头文化的若干特点，比如容器都是薄胎的。但与二里头青铜器相比，商代前期青铜器的器种显著增多，如食器有鼎、鬲、甗、簋，酒器有爵、角、斝、觚、尊、卣、壶、罍，水器有盘、盂等。在形制上有不少特征，容易判别，如鼎多锥足，爵、斝平底，觚体粗矮。

这个时期青铜器的纹饰，还没有作为图案衬地的花纹，即所谓地纹。纹饰大多作带状，并常见弦纹、兽面纹和夔龙纹。兽面纹的线条圆转流动，很有特色。在带状兽面纹上下夹以连珠纹，则是当时流行的设计。

铭文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青铜器上开始有了仅几个字的，以象形为特征的族名金文。

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都城所在地，这里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中心，1949年前后在殷墟发现的青铜器，不胜枚举。

商代后期青铜器，胎壁都较厚，器物种类进一步增多，而且有造型多样化的特点。纹饰内容丰富，变化更加突出，不但流行通体满花，绝大多数使用云雷纹作为地纹，以填

充主题纹饰外的空间，而且还出现了在图案上重叠加花的所谓三层花，于是在青铜器上形成了富丽繁缛之风格。

以故宫博物院的三羊尊为例。这件珍贵的大型盛酒器，气势雄伟，肩部装饰的三只高浮雕卷角羊头，形象逼真。此尊是经过两次铸造而成的，先铸尊体，并在肩部相应的位置上预留孔道，然后在孔道上再搭陶范，铸制羊头。合范法铸造工艺，这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三羊尊腹部纹饰华丽，在云雷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极富神秘的色彩。繁缛与神秘，正是这一时期青铜器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迄今发现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殷墟吴家柏树坟园出土的后母戊（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这件巨大的青铜鼎表现了商朝后期的发达和人民的创造力。

青铜器有许多动物形的容器，可作立体雕塑观赏，如象尊、犀尊、豕尊、羊尊等。最常见的是鸱卣，卣像两鸱相背而立。这一类青铜器，大多数饰有通体的复杂花纹。

商代后期青铜器不仅有发达的礼器，还有众多的兵器，并出现了乐器。青铜兵器包括用于远射的青铜镞，扁平凸脊双翼。用于格斗的戈，分曲内、釜内、直内三式。垂直装秘，可以横击、啄击和钩杀。矛为刺兵，扁体、中脊、侧刃。直体翘首的大刀，单面侧刃，是用于劈砍的兵器。钺多用于刑杀，多有威武生动的纹饰，是权威的象征物。防护装具有青铜冑（头盔），上有兽面形等纹饰。青铜乐器常见的是一种编铙，多以三至五个为一组。使用时，口向上，敲击口沿，奏出高低不同的音响。它被认为是钟的前身。

此期青铜器纹饰中动物纹样大大增加，最典型的花纹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饕餮纹，其形状多变，一般尾部下卷，鼻额突出，咧口利爪，巨目凝视，雄严诘奇。有的大幅饕

餮纹纹体鼓起，曲角高耸，突出器外，配以浮雕龙、虎、羊首、鹿首和牛首等动物形象，峻挺方折、精湛无比；有的全身满施饕餮纹，器体棱脊四起，深镂细刻，富丽堂皇，如亚酏方尊、亚酏方罍等，都是晚商青铜器中出类拔萃的精品，其他花纹还有夔纹、蝉纹、蚕纹、小鸟纹等。这些动物纹样，少数是肖生的，更多的则是神话性的禽兽。

以饕餮、夔等为突出代表的，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各种动物纹，此时被普遍应用，这显然与商人尚鬼的宗教意识有关。兽面形的所谓饕餮纹，是当时巫术宗教仪典中的主要标志，对该部族具有极为重要的神圣意义和保护功能。《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的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象征，对本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所以说，饕餮纹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殷墟期青铜器普遍出现铭文，书体为“画中肥而首尾出锋”的波磔体，有些字体结构尚未脱离图形文字的形态。故宫博物院藏卣其三卣，铭文记述了帝辛时期的赏赐、祭祀等内容，它们是商代铭文最长的几件器。此期有铭青铜器的多数铭文都极为简短，有的仅有一个象形性很强的字，有的由几个象形的字构成一个短语。这类铭文虽少有文例比附，但多数可以在甲骨文方国名、地名、人名中找到同形字，其中有被学者释读的则多是文献中的古国名或家族名。宗教较多的族名，一般可以分出方国、家族、私名等几个层次。此外，也有一小部分这类铭文是表示该铜器的方位、功能，或是八卦符号等，并不属于上述内容范围。族名金文最早出现在商代前期，多数属商代后期到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仍有少数残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真实状况。